

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

● 徐友漁

有人說過：「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現在也有人說：「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卻在國外。」這話固然令人不快，但卻應引起我們的深思。自文革爆發至今近三十年，西方學者從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教育學等方面寫出了大量專著和論文，雖然其中有的給人隔靴搔癢之感，還有一些議論讀後令人忍俊不禁，但其中仍有不少包含着真知灼見。尤其是西方學者看問題角度之廣，思維之活躍，蒐集求證功夫之深，爭辯詰駁態度之嚴肅和執着，再看國內一些錯誤百出的敘述（如《血與火的教訓——文革重大武鬥慘案紀實》），東抄西編的雜湊（如《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真使人感慨嘆息。

國內不是沒有談論文革的書籍和文章，但問題在於很少作品算得上是研究。若按嚴格的學術標準來

衡量，稱得上研究的東西就更是寥寥無幾。國內最有影響的著作大概要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但西方學術界對它評價卻不太高。切克（Timothy Cheek）在一篇書評中以不甚欣賞的口氣說，這部著作由三篇構成，第一篇談毛澤東，第二篇談林彪，第三篇談江青，作者完全以中國傳統的好人—壞人二分法對政治史作解釋。書評者還指出，該書對於文革提供的材料，並沒有超出西方學者掌握的水平，而書中不標註釋說明材料出處，不列文獻目錄和索引，使此書具有通俗性而不是學術性。書評者的客氣之辭是，在課堂上講授中國文革時，此書可以起講述生動，增加例證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增補本在台灣和香港出版後，台灣潮流出版公司發行了英文譯本，上述書評者認為這個英文本譯得匆忙潦草，西方研究者若不對照中文原書，是不能放心使用的①。

有人說：「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卻在國外。」這話固然令人不快，但卻應引起我們的深思。

一 概 況

1966年初夏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爆發，當即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和研究。《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亞洲概覽》(*Asian Survey*)、《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學術刊物在兩三個月之內就開始討論文革問題。《共產主義問題》從當年第5期，即九、十月號起刊登專題討論會「毛主義是甚麼？」(What is Maoism?)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為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是〈毛及其學說〉(“The Man and His Doctrines”)，另一名專家柯亨(Arthur A. Cohen)的論文題為〈毛及其政治學〉(“The Man and His Policies”)，另外還有與會者發表的評論，以及兩位作者的答辯。

接着，從第6期起，《共產主義問題》開展了總題目為「新革命」的系列討論，一直延續到下一年。以下是一些論文的題目，格爾曼(Harry Gelman)：〈毛和不停息的清洗〉(“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陳(Theodore Hsi-en Chen)：〈痛苦中的民族〉(“A Nation in Agony”)，特里爾(Ross Terrill)：〈圍困心理〉(“The Siege Mentality”)，邁克爾(Franz Michael)：〈權力之爭〉(“The Struggle of Power”)，等等。

美國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反應也很快，它的社會科學部的成員和顧問在1966年夏季末就開始系統地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的由羅賓遜(Thomas W. Robinson)主編的《中

國的文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一書，可算作他們的第一項研究成果。此書對文革的分析只到1968年初，包含5篇長論文。第一篇多里爾(W.F. Dorill)談文革是權力之爭、政策和意識形態分歧的結果，第二篇哈定(H. Harding)談毛澤東的政策和組織理論，第三篇羅賓遜談周恩來，第四篇戈托夫(M. Gurto)談中國的外交，最後一篇是巴姆(R. Baum)談中國農村②。

西方研究者一開始就注重追蹤運動的發展，在令人眼花繚亂和目瞪口呆的各種事件中理出頭緒，並理解和揭示其含義。應該說，他們的工作頗為出色。也許是因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緣故，事後看來，他們的看法比起我們當時深深捲入文革的人，要正確得多。這種跟蹤研究的形式和成果是多種多樣的。比如伯雷漢(Philip Bridgman)在1967-1970年的《中國季刊》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毛的文革：起源和發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的文革：奪權鬥爭〉(“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的文革：鞏固權力的鬥爭〉(“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在各省》(*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總結了黑龍江、上海、四川等省市運動的發展③，而另一本書《1967年文革總結》(*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一爆發，當即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和研究。《中國季刊》、《亞洲概覽》、《共產主義問題》等學術刊物在兩三個月之內就開始討論文革問題。西方研究者一開始就注重追蹤運動的發展，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事件中理出頭緒，並理解和揭示其含義。

Review) 則從工人、農民、學生、外交、貿易等各個方面論述了這一年的文革形勢④。

這種把握時局發展和作出概括的努力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較新的著作有福斯特(Keith Forster)於1992年出版《在中國一個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⑤，作者是澳大利亞人，曾在杭州大學當英語教師。他數次來華，在杭州停留較久，閱讀了大量報刊、文件，採訪了當地不少文革參與者。1991年由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出版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15卷，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Revolution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則是一部全面論述文革的巨著⑥。

以《劉少奇和中國的文革》(*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一書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在一篇書評中把西方對文革的研究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關注的問題不同，材料來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的浪潮，並取得豐富成果。第一階段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材料來源主要是紅衛兵寫的大字報和出版的各種小報，研究的焦點是導致文革各種事件的權力鬥爭，這時研究者的注意力放在高層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遷。第二階段是在70年代

末和80年代初，這時注意力轉向了紅衛兵的派性鬥爭，社會矛盾和衝突，研究的範圍擴大到了1968-1976年。文革中不少人從大陸逃至香港，研究者勤奮地採訪難民，獲得不少第一手資料。第三階段是從80年代中期之後到現在，西方研究者更深刻地探究文革的原因和後果，由於中國的開放政策，他們可能獲得更豐富、更可靠的資料，因而把對於文革的研究深化了⑦。

西方學者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研究文革時，由於不能身臨其境，又得不到第一手材料，不少人的見解顯得幼稚和天真。比如，徐(F.L.K. Hsü)全然不願運動初期紅衛兵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認為紅衛兵是攻擊以血緣關係為內涵的傳統遺產的工具。他的推理完全是一廂情願和先驗的，他認為中國的任何執政黨的目標都是使國家工業化，而中國人只要還受傳統的血緣關係的羈絆，就不能達到這一目的。只有懂得紅衛兵運動是以衝破血緣關係為目的，才可理解這一運動⑧。到了80年代，西方學者可以親自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他們得到許多新信息，同時還受到中國人自己觀點的啟發，因此形成新的看法和結論。白魯恂(Lucian W. Pye)反思說，西方一些自由派人士在文革發動時抱理想主義情懷，他們的重大失誤是不承認文革中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對於人們備受迫害的報告充耳不聞。對於西方的研究成績，他的評價是，對文革的直接起因研究較好，對於根本原因，即使文革成為可能的深層的文化和政治力量這方

白魯恂評價西方一些自由派的文革研究最大失誤是不承認文革中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他認為對文革的直接起因研究較好，而對根本原因，即使文革成為可能的深層的文化和政治力量這方面的研究則不行。

面的研究則不行^⑨。施拉姆已是公認的權威，但他還是十分重視從最新信息中形成新見解。他在80年代中訪問中國時，從知情人士處得到一條信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反冒進的文章，其實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起草的，毛澤東從未忘記這一點，這是毛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施拉姆力圖根據這樣的消息，重新考慮文革中毛、劉、周之間的關係和權力鬥爭格局^⑩。

二 文革的起因

顯而易見，對這場所謂「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作研究，最核心的問題，也是最令人困惑的問題，是了解它的起因。由於文革之火是毛澤東親自點燃的，因此，問題基本上集中於探討毛澤東為甚麼要發動文革。回答當然是五花八門的，但大致可歸納為三種不同的類型。一是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堅持他的社會理想，二是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三是以上兩種觀點的綜合，認為文革起源於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多數領導的政策分歧，由此導致權力鬥爭。

說來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學者接受了發動文革是為了「防修反修」的說法。陳認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於修正主義的根子隱藏在人們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務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個層次：第一，改造群眾思想，使之為革命而犧牲物質利益；第二，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第三，改

造知識份子^⑪。哈定則認為反修的任務主要針對官僚主義，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擴大群眾的政治參與，特別是希望青年關心革命，關心國家大事^⑫。伊斯美(Jean Esmein)認為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澤東和他的親密助手發動人民群眾，重新掌握國家權力，從而使黨得到新生^⑬。富勒爾(Victor C. Funnell)認為，文革產生的原因是毛澤東極為敵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在這種意義上，文革完全與文化無關，而與社會和經濟有關。毛澤東擔心，如果聽任人們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差別越來越大，最後黨就會和群眾失去聯繫^⑭。胡費爾(Richard M. Rfeffer)認為，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因為它是以前革命的繼續，「可以把文革理解為一場更大、更雄心勃勃的運動，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某些革命目標」，當中國社會出現等級化、特權化時，毛澤東希望恢復革命的活力，重申他關於美好社會的理想。就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主張的那樣，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為技術和經濟的進步而導致的道德退步和社會腐化^⑮。

另一批人則從權力鬥爭角度看待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斷言^⑯：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藉口，

胡費爾認為，可以把文革理解為一場更大、更雄心勃勃的運動，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某些革命目標，當中國社會出現等級化、特權化時，毛澤東希望恢復革命的活力。

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之後進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

格爾曼說，毛澤東發現黨內從上到下都對他不忠實，因此決定清洗。不僅如此，他還要通過運動在黨內製造一種嚴峻氣氛，使黨內決不可能存在反對派，大家都對他頂禮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後，黨也要可靠地實施他的革命藍圖¹⁷。伯雷漢聲稱：「毛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是發現並消滅黨和政府中的敵人，代之以忠誠和有獻身精神的支持者。」他還認為，「毛對從上而下地對黨作清洗的結果不滿意，他鍛造了新的武器——紅衛兵，以進行自下而上的清洗」¹⁸。

關於文革起因，持第三種解釋的人最多，他們認為意識形態和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是交織在一起的。兩位杜特(Garg Dutt & V.P. Dutt)在《中國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認為，文革中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領導人對於採取甚麼辦法肯定會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發展得尖銳而不可調和，因為這常常和個人尊嚴和權力密切相關。如果領導人意志堅強、固執己見，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麼上層領導就會分裂¹⁹。楊(C.K. Yang)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文革本來關乎文化和意識形態，怎麼變成了奪權鬥爭？他的回答是，這場運動的中心問題是修正

主義，而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搞修正主義，於是清洗從文化領域擴展到黨的高層領導，他認為運動的發展模式必然如此²⁰。約菲(Ellis Joffe)在〈文革還是權力鬥爭？〉(“China in Mid-1966: ‘Cultural Revolution’ 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出，這場運動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識形態的整風運動和最高領導層的權力問題是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一直擔心，除非不斷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燒，否則中國就會變修²¹。赫尼克爾(Paul J. Hiniker)提出了他所謂的「不合諧歸化」理論來調合權力之爭說和意識形態之爭說。他的這個概念頗為複雜，簡單說來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對一件事的失敗有不同的解釋，比如大躍進失敗了，不堅信它的人認為它不切實際，而堅信它的人則認為有階級鬥爭，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搞破壞。他承認文革有權力鬥爭，但認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服從於達

費正清(左)等西方學者在文革初期就注意到整個運動的趨向，並相繼發表了富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



史華慈認為，在老年毛澤東那裏，中國古代賢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分量。他不像劉少奇和列寧，事事依靠作為先鋒隊的黨，而認為普通群眾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眾的廣泛參與是至關重要的。

到意識形態一致的手段。他宣稱，他的理論可以對毛澤東要打倒誰作出更好的預言²²。西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的觀點屬於這最後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詳盡分析了自1956年後，特別是大躍進失敗後中共最高層的政策分歧，說明這種分歧最後不可避免要導致權力鬥爭。也有人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衝突歸之於兩人的性格、氣質的差異，以及由於革命經歷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風。安邊戎(Byung-joon Ahn)認為，毛的領導方式是個人性、最高元首式的，他善於啟發和鼓動群眾，直接與群眾溝通；而劉善於組織，在黨內操縱，依靠龐大的體制化機器，這兩種十分不同的作風最終會發生碰撞，演化為權力衝突²³。迪特默持類似見解，他說，毛感情衝動，性格奔放，劉一絲不苟，謹小慎微；毛的性格適合在廣大農村動員群眾打游擊戰，而劉的作風與白區工作需要極端小心有關²⁴。

附帶指出，迪特默在《劉少奇和中國的文革》一書和〈路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劉之間的鬥爭看成是一種「路線鬥爭」，即是說，在指導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見而無法調和導致的鬥爭。作為西方學者，他對是非功過不作價值判斷。他強調的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起因於路線、政策分歧，而不是預先有一個「密謀」，蓄意打

倒劉，而劉的倒台是運動中群眾起來，鬥爭不斷升級的結果²⁵。不知為甚麼，大陸中文譯本《劉少奇》一書的出版者和譯者卻未能正確理解迪特默的觀點。中譯本「內容簡介」說：「作品用大量的資料說明：發動文革是一個「密謀」，其目的就是為打倒劉少奇及其追隨者而設下的陷阱。」這可能是對共和國主席悲慘遭遇的同情而產生的理解誤差。我認為出版者和譯者對事情本身的理解是對的，但迪特默的原意卻並非如此。

著名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喜好從文化與傳統角度理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待文革，他同樣如此。史華慈認為，在老年毛澤東那裏，中國古代賢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分量。他不像劉少奇和列寧，事事依靠作為先鋒隊的黨，而認為黨之外的普通群眾不通過組織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眾的廣泛參與是至關重要的。毛和盧梭一樣，認為群眾不必是他們本身所是的人，而可以是「應當成為」的那種人，這就導致了領導用自己的光輝思想來改變人性²⁶。

里夫頓(Robert J. Lifton)的觀點似乎有點荒誕不經，卻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他用類似於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來解釋文革的發動。他認為，中國的偉大領袖在晚年面臨的危機，是一種對死亡和死亡後世界狀態的憂慮。毛澤東知道自己在生物意義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會受到修正主義威脅，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傳。文革是共產主義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

者是青春年少、階級成分純潔的紅衛兵，他們破四舊，攻擊老一代，這是向舊時代宣戰，用心理學語言來說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戰^②。

三 派別劃分和社會衝突

有一批對文革有深入研究的西方學者，反對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層的權力鬥爭或路線鬥爭，他們把自己的解釋模式稱為「社會衝突模式」。陳佩華(Anita Chan)一直鼓吹這個模式，她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說，把文革說成是一場以老幹部為一方，以毛和四人幫為一方的權力鬥爭，根本就抹殺了人民，尤其是紅衛兵青少年在文革中的作用。「社會衝突模式」與通常的看法(即認為群眾在文革中沒有差別)相反，注意到群眾在運動中分裂為嚴重對立的兩大陣營，即保守派和造反派。這種對立反映文革前一直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矛盾^③。

韓裔美籍學者李鴻永(Hong Yung Lee)在1975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文革「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某些社會集團發現他們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變中國政治體制，而另一些人則力圖維持現狀，在群眾和精英層中都發生了激進派和造反派的分化。基本區別是對運動對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擊「走資派」，另一派攻擊知識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問題成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階級陣線，支持「自來紅」觀點：激進派根據是否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劃分陣線，反對血統論。保守

派由出身好的人組成，激進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李鴻永注意到，由家庭出身而產生的歧視在中國滲透到了日常生活，出身不好的人犯了錯誤是嚴重的政治問題、立場問題，而同樣的事若發生在出身好的人身上，則只是方法問題、枝節問題。他還注意到，經濟因素對工人的派別劃分所起的作用較大，一般而言，地位較低的合同工、臨時工、輔助工、徒工、半工半讀中學生、小廠工人等構成了激進派的主力。在激進派中，下鄉知識青年是最活躍的力量^④。

李鴻永在1978年的著作中指出，文革中精英集團企圖動員和操縱群眾，但黨組織的控制一旦削弱，社會中所有潛伏的張力和矛盾就表面化了，群眾運動依靠自身的力量前進。群眾組織把官方意識形態和政策當成追求小集團利益的工具，合則擁護，不合則拋棄。他看到中國社會產生了官僚化這個嚴重問題，黨和群眾的關係疏遠了，對平等的要求淡薄了。他還總結說，激進的群眾組織主要由無特權的社會集團組成，而保守份子主要來自優裕的社會集團^⑤。羅森(Stanley Rosen)對李鴻永1975年的論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學生中的造反派(李鴻永稱為激進派)，主要是由家庭出身一般而不是出身不好的人構成的，因為許多出身不好的人長期受壓，不敢參加政治運動，而且即使是造反派組織也有些排斥他們。另外，大學生的派別形成不像中學生那樣以家庭出身為重要因素，因為他們在升入大學時已經通過了競爭^⑥。

李鴻永指出，文革中黨組織的控制一旦削弱，社會中所有潛伏的張力和矛盾就表面化了。群眾組織把官方意識形態和政策當成追求小集團利益的工具，合則擁護，不合則拋棄。

懷特認為，文革中的混亂、暴力是由反映中國社會矛盾的三種主要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給人戴帽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使人們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每個單位，群眾與領導是人身依附關係；周期性的政治運動使得暴力合法化。

陳佩華、羅森和安德佳 (Jonathan Unger) 以「社會衝突論」為指導方針，對原廣州的紅衛兵作了大量採訪，發表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論著。他們在合寫的論文〈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衝突的社會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中認為，學生的衝突起源於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學生向上的前途不寬闊；二、由於入學標準的變化(從重視成績到重視家庭出身，以及強調政治表現)，學生為升大學展開了劇烈競爭；三、許多學生的競爭手段是急於入團；四、政治上的競爭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階級背景的對立轉化成紅衛兵的派性^②。在這篇論文之後，三人分別發表專著，詳盡發揮以上論點。羅森於1982年發表《廣州紅衛兵派性和文革》(*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在廣州紅衛兵派別劃分和學生家庭出身方面建立聯繫。安德佳於同年發表《毛統治下的教育：1960-1980年廣州學校中的階級和競爭》(*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闡述文革前的家庭出身歧視，學校中「紅」與「專」的矛盾，以及這些問題在文革中轉化為「革」與「保」的對立。陳佩華於1985年發表了《毛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人格發展和政治積極性》(*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ly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從學校教育和家庭出身的角度，論述了紅衛兵一代人的主要社會性格是權威人格。知識青年在文革中有格外引人注目的表現，他們的態度異常激進，他們是文革前選拔制度的失敗者，他們的遭遇反映了中國社會尖銳的矛盾。羅森於1981年發表了《下鄉知青在中國文革中的作用》(*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闡述知青與派性鬥爭的關係以及他們的重要性。

懷特(Gordon White)在其著作《階級政治和階級根源》(*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指出，雖然家庭出身在文革前決定人的政治地位，且在文革中決定人的派性，但階級或成分的定義是含混不清的，文革也未能解決這方面問題。另一位懷特(Lynn T. White)在《紊亂政治學：中國文革中暴力的組織性原因》(*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認為，文革中的混亂、暴力是由反映中國社會矛盾的三種主要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它們是：給人戴帽子(工人、幹部、地主、反革命等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使人們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在每個單位，群眾與領導是人身依附關係；周期性的政治運動使得暴力合法化。夏(Adrian Hsia)的著作《中國的文革》(*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專從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這一角度研究文革。他考察了各式

各樣的矛盾，如學生與學校、政府的矛盾，知識份子與體制的矛盾，工農與政府的矛盾，黨內新老幹部的矛盾，等等。官僚化和特權階層的存在也是西方學者關注的問題。哈定在《組織中國：1949-1976年的官僚問題》(*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一書中，從組織政策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官僚化原因。他認為，官僚化問題對於中國是難於解決的問題，因為要想現代化，沒有複雜的分工和官僚化機構是不行的，而官僚體制又將損害社會。森卡爾(Oded Shenkar)持相似看法，他認為文革的結果表明，官僚主義是避免不了的，努力的方向不是消滅官僚主義，而是對其作出改善^③。有不少人在這個問題上對文革持肯定態度，例如巴契爾(C.S. Burchill)認為文革是成功的，他還建議，為了防止官僚化的發展，要保存和發展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和五七幹校一類的機構，前者提供了批評政府的渠道，後者有助於官僚主義者轉變態度^④。費爾(Ferenc Feher)和赫勒爾(Agnes Heller)說，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中，列寧不重視平等問題，斯大林蔑視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文革期間，第一次實現了平等^⑤。克勞斯(Richard Kraus)認為，文革之後，官僚特權問題比起毛的時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階級衝突表現在對有限的物質利益的分配方面，尤其表現在執政的官僚與非黨知識份子、科學家、城市企業家和在政治上覺醒了的青年之間。階級矛盾雖然和毛的時代不同了，但將會繼續發展^⑥。

四 影響和後果

文革的影響和後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關注的問題，這方面的論著一直持續不斷。比如，在70年代中期就有多默斯(Jürgen Domes)的《文革後的中國》(*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s Between Two Party Congresses*)，張亦春(Chang Yi-chun)的《中國的派別和結盟政治：文革及其後果》(*Fractional and Coalition Politic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以及布魯格爾(Bill Brugger)編的《中國：文革的影響》(*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不過，應該說，這幾本書並沒有對文革造成的影響作出深刻總結，主要內容還是敘述文革中發生的事件，而且常常描述得不準確。

早在1969年，張旭成(Parris H. Chang)就看出，文革對於中共的統治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文革中的清洗並未按照黨章國法規定的程序進行，亦沒有明確的標準來判斷幹部是好的還是「三反份子」，無數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他們其實是無辜的。張指出^⑦：

文革中對黨的高級領導人漫無邊際的指控損害了黨的形象，這看來是無法修復的。號召造反和奪權的效果是，不僅年輕人，而且大多數人蔑視權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會，甚至中央領導的權威。

泰韋斯(Frederick C. Teiwes)在研究中共領袖合法性問題的專著

巴契爾建議，為了防止官僚化的發展，要保存和發展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和五七幹校一類的機構，前者提供了批評政府的渠道，後者有助於官僚主義者轉變態度。

中認為，文革產生了信任危機，對於毛澤東的權威是個重大打擊。他指出，文革造成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不滿，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識份子，在農村過着貧苦生活的知識青年，以及在運動中受到衝擊的黨政官員。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鬥爭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種種懷疑和不滿終於引發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事件，這是對毛的權威的直接打擊³⁸。

許多西方研究者敏銳地看出，文革不僅以武鬥傷害了千百萬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騙和謊言傷害了人們的心靈，尤其是對年輕人。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後的中國》(*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第20章〈文革的社會後果〉中說，千百萬人在文革中因為鬥爭會、派性武鬥、鎮壓而在肉體和精神上留下嚴重創傷。孩子們因父母的問題而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揭發批判，數百萬人被非法監禁，數百萬人在窮鄉僻壤虛度光陰。他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前程被毀掉了。青年學生的理想被粉碎，因為文革的崇高目標和殘酷的現實之間有一條巨大的鴻溝，他們從理想的一代變成了迷惘的一代。辛格(Martin Singer)以極為惋惜的口吻說³⁹：

對於多數中國學生而言，文革使他們不可補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純真。這種純真——以及相伴的樂觀和獻身精神——對於奮力拚搏以告別過去，並在現代各國確立自己地位的國家而言，是寶貴的資

源。這種純真只會失去一次。在一個老革命家為從不可避免的歷史風暴中保留自己遺產的很不成功的鬥爭中，這種純真失落了，這是文革的真正悲劇。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說：「潛藏在各種對於文革後果反應後面的，是一種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地位和榮譽的失落；前途和尊嚴的失落；時間、真理和生命的失落；總之，幾乎一切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的失落。」她還認為一位被採訪者的話很能說明問題⁴⁰：

現在中國有一種認同危機，類似於杜克海姆(E. Durkheim)在他論述無目的性問題時所描述的危機。準則是人類行為的最終基礎，但現在準則已分崩離析，但又沒有新的準則來代替。因此，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正面臨一個無目的時期。人們不清楚他們在追求甚麼，他們要甚麼。他們想要改變，但甚麼樣的變化是合適的，他們並不確定。

哥爾德(Thomas B. Gold)從一個頗為別緻的角度(人際關係的變化)研究文革的後果。他說，傅高義(E.F. Vogel)曾指出，自1949年以來，中共在50、60年代比較成功地把人際關係的標準和行為的特徵從舊的友情式轉變為同志式，他認為經過文革，人際關係又向傳統方式回歸。文革之後，人情、關係、後門、請客送禮代替了以前一視同仁的同志與工作關係。這是因為文革中左派在「塑造社會主義新人」

邁斯納看到人們在文革中享受過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組織，利用大字報等手段表達他們的不滿和希望。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經歷，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合法權利，會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將之加以保衛。

方面做過了頭，使以前的革命價值和典範失去了信譽^①。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壞的同時附帶產生的正面影響。白魯恂認為，文革使中共領導打開了眼界，看到了失敗的現實，不但看清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還使他們擺脫了傳統的優越感，能更好地理解 and 利用外國的好東西。沒有文革，他們就不會和蘇聯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決裂^②。鄒讜認為，文革也使某些掌權者受到再教育。他們年輕時滿懷理想投身革命，反對壓迫和社會不公正，他們在中年時期成了掌權者、整人者。文革中的遭遇使他們反思中國政治制度中的法西斯主義，他們產生了改革黨和國家制度的願望^③。

邁斯納還看到，經過文革，人們的政治覺悟和以前大不一樣了。他們在文革中享受過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組織，利用大字報等手段表達他們的不滿和希望。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經歷，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合法權利，並會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將之加以保衛^④。施拉姆也認為，文革雖遭否定，但卻給中國留下持久的東西，反官僚、反權威的精神是人們的寶貴經驗，青年一代學會了獨立思考^⑤。

當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麥克法夸爾把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和1966年文革開始時在同一地方發生的事情聯繫起來思考。他在6月22日寫成的文章中說，儘管和以前相比有若干不同之點，但1989年的抗議者和鎮壓者都在文革的陰影中行動。鄧小平及其同僚想

起紅衛兵在城市引起的混亂和破壞就驚慌不安，想到幹部受衝擊，黨組織癱瘓無力，他把學生運動和當年造反派搞天下大亂當成一回事。而過去的紅衛兵在1989年正是35-45歲的一代人，他們還記得毛澤東「造反有理」，「敢想、敢說、敢幹」的教導，他們具有向權威挑戰的經驗。但麥克法夸爾未能說明，有多少前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活動，或是提出證據，證明他們用當年的造反精神來鼓動青年學生^⑥。

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還有許多重要方面不能在這篇文章中介紹，尤其是他們對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文革對工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影響，以及中國外交方針在文革期間的變化等等，這些研究範圍較集中，成果也頗為豐富。我只希望，在了解西方學術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學者能真正創出一門「文革學」來。

當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麥克法夸爾把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和1966年文革開始時在同一地方發生的事情聯繫起來思考。他在6月22日寫成的文章中說，儘管和以前相比有若干不同之點，但1989年的抗議者和鎮壓者都在文革的陰影中行動。

註釋

① Timothy Cheek: "Book Review: *The Ten-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122 (1990), pp. 311-13.

② Thomas W. Robinson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③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④ Michael Oksenberg et 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 ⑤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M.E. Sharpe Inc., 1990).
- ⑥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⑦ Lowell Dittmer: "Book Review: *Politics of Chaos/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3 (1990), pp. 1049–51.
- ⑧ Francis L.K. Hsü: "Chinese Kinship and Chinese Behavior",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Vol. 1, Book 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602–603.
- ⑨⑫ Lucian W.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108 (1986), pp. 598–604; 610.
- ⑩⑬ Stuart R. Schram: "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 cit., pp. 615; 622–23.
- ⑪ Theodore Hsi-en Chen: "A Nation in Agon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Iss. 6 (1966), pp. 15–20.
- ⑫ 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34–63.
- ⑬ Jean Esme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chor Press, 1973), p. 330.
- ⑭ Victor C. Funnell: "Social Stratific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 Iss. 2, pp. 14–20.
- ⑮ Richard M. Pfeffer: "The Pursuit of Purity: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I, Iss. 6 (1969), pp. 13–21.
- ⑯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p. 13.
- ⑰ Harry Gelman: "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Iss. 6 (1966), pp. 2–12.
- ⑱ Philip Bridgham: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 and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Iss. 41 (1970), p. 1 and Iss. 29 (1967), p. 26.
- ⑲ Garg Dutt and V.P. 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p. 2.
- ⑳ C.K. Ya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visionism", *China in Crisis*, Vol. 1, Book 2, p. 505.
- ㉑ Ellis Joffe: "China in Mid-1966: 'Cultural Revolution' or Struggle for Power?", *China Quarterly*, Iss. 27 (1966), p. 124.
- ㉒ Paul J. Hinik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Dissonance Reduction or Power Maximiza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94 (1983), pp. 282–303.
- ㉓ 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China Quarterly*, Iss. 58 (1974), pp. 255–61, and the same author: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pp. 227–29.
- ㉔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Ch. 5.
- ㉕ Ibid., Ch. 2 & 3, and the same author: "'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China Quarterly*, Iss. 72 (1978), pp. 675–712.

- ②⑥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35 (1968), pp. 14-17.
- ②⑦ Robert J.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p. 7-35.
- ②⑧ Anita Che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 No. 1 (1992), pp. 62-63.
- ②⑨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64 (1975), pp. 645-83.
- ③⑩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1-5, 324.
- ③⑪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70 (1977), pp. 395-98.
- ③⑫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Iss. 83 (September 1980), pp. 397-446.
- ③⑬ Oded Shenkar: "Is Bureaucracy Inevitabl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4, Iss. 5 (1984), pp. 289-306.
- ③⑭ C.S. Burchill: "Bureaucracy Versus Democracy: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Queen's Quarterly*, Iss. 79, Vol. 2 (1972), pp. 136-44.
- ③⑮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Equality Reconsidered", *Thesis Eleven*, Iss. 2 (1982), pp. 23-40.
- ③⑯ Richard Kraus: "Bureaucratic Privilege as an Issue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Development*, Iss. 11, Vol. 8 (1983), pp. 673-82.
- ③⑰ Parris H. Chang: "Mao's Great Purge: A Political Balance Sheet",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I, Iss. 2, pp. 5-10.
- ③⑱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M.E. Sharpe, 1984), Ch. 1.
- ③⑲ Martin Singer: *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1), p. 83.
- ④⑰ Anne F. Thurston: "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 *Pacific Affairs*, Vol. 57, No. 4 (1984), p. 605, Vol. 58, No. 1 (1985), pp. 24-25.
- ④⑱ Thomas B. Gold: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 104 (1985), pp. 657-68.
- ④⑳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48, 257, 302.
- ④㉑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Ch. 20.
- ④㉒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En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36, Jul. 20, 1989, p. 8.

徐友漁 1982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學位。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等，從1993年起發表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論文及書評。